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

张立文
主编

程颢 程颐评传

——倡明道学

——观理识仁

潘富恩 著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 儒家系列 · 张立文 主编

程颢 程颐

评传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 倡明道学 观理识仁 潘富恩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

程颢 程颐评传

——倡明道学 观理识仁

潘富恩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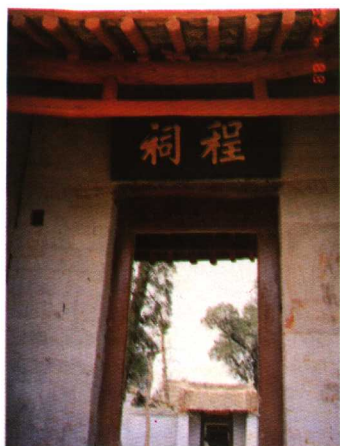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7.5 印张 插页 7 173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册

ISBN 7-5435-2400-7/K·56 定价:13.50 元



座落在河南省伊川县的程祠



程祠大堂上的匾额



程祠大堂中的塑像。中为程珦(二程之父),左右黑须者为程颢,白须者为程颐。

程祠后院中的程颢墓



程祠后院中的程颐墓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总 序

戴 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治国方略、管理方法，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文化现象都在人民群众的活动中体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覆盖面更为拓展，文化的内涵日益深邃，在各门各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他们努力钻研，求实创新，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由于作者大多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以作者队伍整齐，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

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会吸收。

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方面，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无糟粕。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称颂、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也要取这样的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希望本丛书能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是为序。

1994年5月

序

儒家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

张立文

广西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责我主编，我借机说说儒家文化精神等问题。

80年代初以降，中国大地掀起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在这文化讨论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曾成为人们论争的热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各家所见有异：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或主干；有以道家文化为主干；有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干；或以中国历史上所建构的，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过影响的各种思潮为内容。这种种界说，都与界说者的价值取向不同相关联。虽解释纷纭，但都不否认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思想中起着巨大的、普遍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正由于这种状况，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文化论争也往往把问题聚焦到这一点上来。

论争儒家文化而不知儒家文化是什么，无疑是很遗憾的。这次选择各个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合为儒家系列，可补这方面知识之缺。

传统儒家文化在哪些方面蕴涵着向现代机制转换的因素、胚胎、萌芽？儒家文化在现代有否生命力？当前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以至如何继承、转换传统文化的方法，

亦论争不休。如抽象继承，具体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地解释、综合、创新；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等等。凡此种方法，都涉及主体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价值观念的不同，其所谓继承，其所谓体与用，都会不同；如何创造转化？如何创新？如何复兴？也会大相径庭。

因此，传统文化的转换和延续，不在于寻找它与现代化的联接点，或某一命题的继承，而是在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种生命力，后者是一种生成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或静态的传统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汤因比、池田大作，还是E·希尔斯，都没有能将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既定的传统及两者的关系和区别等论述清楚。

我们从儒家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层面上，来“观”儒家文化，可获得这样一些共识：

第一，整体主义的文化精神。人在宗法血缘的纽带中，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便是人存在的根据，并以人为中介，构成自然、社会、家庭的整体化结构。传统儒家文化讲天、地、人三才，此人是与天地对应的整体的人，蕴涵着社会群体，构成天、地、人一体化的整体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在这种价值观念系统下的个人，便融化于整体之中；个人对于整体，义务重于权利，整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个体价值只有通过整体价值才能体现，个人只有在整体（家族、集团或国家）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这样，个体价值、利益、个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然而，却又培育出为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以他人、以集体为重的崇高情操；先忧后乐的高尚品格；重国

家统一，反对分裂，注重发挥集体智慧与力量的文化精神。

整体价值的内在深层蕴涵，是整体意识。这里所说的整体意识是个体意识错综复杂的总和，是一定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它适应整体实践需要，维持整体的一定社会关系的利益，对克服损公利己，以权谋私等破坏整体社会秩序和利益的行为，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整体意识见之于认知活动，便是整体思维。整体思维是指思维对象、成果和运用思维成果对思维对象的改造，都注重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反映对象、对事物作整体把握的整体观念。整体性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思维指向和思维的侧重点，超越经验思维方式，以完善理论思维方式，从而成为信息处理转换和生产一定精神产品的内在机制，转化成现代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整体主义文化精神和日本的团体主义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其重要的价值。

第二，人为中心的文化精神。儒家文化特别重视人、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既以人为万物之灵，又以人为自然、社会的中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正是通过对主体人的塑造而实现其功能的。儒家文化讲天上地下，人在中心。由人才把天地沟通起来，构成完整的宇宙世界。“为天地立心”，天地以人心为心；无人，天地万物只是自然的存在，而无所谓价值和意义。天地万物由于人的存在和需要，才有价值和意义。由于人的活动及其关系而组成社会。人的责任和力量，就在于能有组织性地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为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以人为中心管理控制自然、社会，可使自然、社会按照人的周密、合理的安排，而发挥各个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世界上能把任何一种存在物转换成自己对象物的，惟有人，惟有人自我创造。天地间惟有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惟

有人能协调、克服自我创造的高科技所带来的负效应，而继续自我创造。以人为中心的人的自我创造，才会发挥人的最大的积极性和潜在的创造性，把人从现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灾难和危机中解放出来，创造一个和合的世界。

第三，和合人文精神。和合是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天地万物之所以生，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关系等，和合是一普遍的根据和原理。以发生学角度来看，和合是人们关于天地万物、日常生活、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养生等对待多样性的冲突融合在思维中的展现。天地阴阳和合而生万物，夫妇男女和合而生新一代，万物人类并非主宰者上帝、神灵或绝对观念的创造，而是异质要素的和合。

和合本体是对于形上学本体论和上帝创世说的否定，以获得主体人与自然天地万物和谐发展的实现。和合作为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使社会凝聚一起而不离散，和合既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亦是社会不分裂、不分散的聚合剂。和合这两种功能，它的现代转换机制，无论在处理现代社会、世界事务还是国家事务中，都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和合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原则，“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精神以及无过不及，“恰好底道理”的度的把握，使人际关系获得和谐团结。

这种和合精神体现为天地万物与吾一体，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这并不是说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只有和谐，而无西方人的征服自然的意识。荀子以天为自然界，人与天各有职分和功能，人不能与天争职，天亦不能降祸福于人。天与人各尽其职，又能相互配合（能参），天与人互补，才能有天与人两极的协调和合。

第四，尊师重教精神。中国历来重视对人的教育，主体人一般指人的身心结构的统一，即人的物质存在形式与精神存在形式的和合。人的物质存在是社会生命存在的形式，人与周围的社会，自然有着密切的物质、知识、信息、情感的

交换关系。中国先秦时代便已有这种自觉，并贯彻在对人的教育中，形成了从胎教、家教到社会环境教育一套系统、完善的教育制度。先秦时便对胎教的重要性进行探讨，并对如何进行胎教作出示范。“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胎教杂事》，《新书》卷十）。食正味，听正声，给胎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心理状态。古人对少年教育人文环境的选择，亦非常注意。“孟母三迁”，展现了孟子母亲对少年孟子教育人文环境的重视。

在教育制度上基本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官方有太学、州学、县学等。私人有私塾、书院、精舍等，比较普遍，并深入穷乡僻壤，构成官、私互补互动的完整教育体制。孔子首创私人办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贵贱等级的限制，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并收很少一点学费（实物）。在教育方法上注意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培育学生真才实学，发展其智力。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很尊重，成为“天地君亲师”之一。

中国古代之所以成为世界文明古国及其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与对教育重视分不开。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教育是根本，没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现代化就会落空。

第五，择优的精神。“学而优则仕”，2500年前的孔子就认识到仕必须是学习知识的优秀者。文有文官考试制度，武有武官考试制度，文武官员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专家。国家各级官员，即现代所说的各级管理机构领导、公务员，是以“学而优”为标准，这样就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和选拔官员机制，排除了任人惟亲，保证了官员的基本素质。

宋代初级行政管理单位是县，县的主要官员（知县、主簿、县尉）必须从获得国家最高级进士学衔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是经过各级严格考试而选拔出来的。从当时价值观来说，一般是优秀分子。经进士考试而上

来的官员，被社会舆论所普遍尊重，认为是正途。一些享有荫恩的大官的儿子，宁愿走科举的正途。从当时而言，进士出身的官员大抵是掌握了当时最高、最全面的知识精英，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

第六，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和责任感。文化主体意识是指具有思维能力并能动地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认知、创造文化活动的主体，对于一定社会生活过程、条件在观念上的观照的自觉。诸如忧患意识，是人们从忧患环境的搅扰中，对于人性尊严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体验，并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超越忧患，而激发出承担责任的博大情怀。这种博大情怀直接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救民的行为活动，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民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儒家文化精神的这六个方面，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是过去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和价值，可称为历史文化生命。文化生命的延续，即文化精神的承传。任何延续和承传都是新的文化环境、条件下的延续和承传，是被新文化的环境、条件所改变、所改造的以及吸收内部各学派优秀成分和外来文化优秀成分和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文化精神的转生。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是按照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文化精神延续、承传转生的特点而选择入选人物的。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文化的开创和完善者。孔子以仁为宗旨，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学，确立道德心性主体的内圣成德之学；荀子则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天人之学和外王事功之学，使儒家“仁”——“性”——“天”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

两汉至隋唐，适应于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经学儒学。秦始皇以打天下的法家之学来治理天下，强秦很快灭亡。汉初

知识分子深刻反省这一历史教训，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需要。董仲舒援阴阳家、名家、法家入儒，把各家思想和合起来，使元典儒学实现了转生，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新形势、新时代的需要。从汉至唐，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道教文化逐渐兴盛。唐代在形式上采取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政策，以其文化的多元性适应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要。三教相互诘难，亦相互吸收，促使学术的发展。然韩愈激烈排佛批道，以恢复儒家仁义内涵，企图与佛道抗衡。他所开启的古文化运动，即儒学复兴运动，开宋明理学之端绪。

宋明时开创了理学儒学。唐末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对儒、释、道三教都是严重的破坏，寺院经济衰落、社会失序，道德沦丧，都需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进行重建，宋明理学家把儒、释、道三家思想和合起来，实现了儒家文化精神的转生。理学的奠基者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开理学一代之学风。朱熹和合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的理气、道器、无极太极、动静之学，集理学中道学之大成，称为程朱道学（亦称理学）或程朱学派。陆九渊与朱熹相抗衡，主张心即理而创立心学一派，王守仁创造性地解释孟子和陆九渊的心性之学，提出“致良知”主张，集心学之大成，称陆王心学，或陆王学派。王夫之承张载的气哲学，提出“理即气之理”，“理在气中”等思想，集张载以来气学之大成。

理学儒学形态经由程朱、陆王、张王，而使传统儒家理学文化理论建构趋于完备，影响日本、朝鲜、越南，且朱子学和阳明学成为日本的显学，朱子学成为朝鲜、越南的显学，从而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影响深远。

近代儒学是在西方文化以其炮舰和鸦片毒品走私的侵略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儒家学者在中国被西方所打败的强烈刺激下，在学习、融会西方文化的情境下，把西方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引入儒学仁的思想，儒学表现为新学的形态，称新学儒学。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谭嗣同等。由于与其他专

题冲突，故“儒家系列”中未收。

儒家文化精神在其发展的元典、经学、理学、新学等四个阶段，都经过冲突、融合而和合为新的文化生命，而转生为每个时代所需要的，适应新文化环境的儒学。这种文化生命的转生，亦是儒家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过程。

儒家文化中许多糟粕方面，虽然与其生长的社会土壤一起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亦会延续下来。诸如专制主义，独裁主义，官僚主义，宗族主义，任人惟亲，血缘等级，特权观念，家长统治，个人崇拜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等思想，都需要每个人警惕自省，不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借尸还魂或死灰复燃。

是为序。

1994年7月

1995年10月重写

前 言

传统的儒学发展到宋代，遂演变为理学。它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的主流，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理学的若干原则，成为当时社会评判是非、臧否人物的基本标准之一。

从表面上看，理学沿袭多于创新，它所涉及的主要范畴、命题和关系，很少是由理学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诸如天道、无极、太极、理、气、道器、阴阳、五行、动静、体用、格物致知、本末、性、命、心、情、仁义礼智信、忠恕、恭、敬、诚、义利、理欲……无一不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找到出处。然而理学对于这些命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赋予它们新的内容和涵义，这样就不仅扩展了原有命题的理论深度，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际上，理学借助历史的思想材料，翻造了一座新的哲学殿堂。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深化，使中国思想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说到理学，就不能说到理学的实际奠基人——北宋中期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二程以前，先有宋初“三先生”（胡瑗、

孙复、石介)倡导儒学的复兴,后有周敦颐、张载、邵雍说“理”谈“气”,使理学初具雏形。但直到二程兄弟开创“洛学”,才最终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因为真正将“理”或“天理”扩展为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从二程开始的,而且理学所有的重要范畴和命题,也是从二程开始才有系统的阐释的。

南宋以后,理学内部有“理学”和“心学”两大派系。它们互相攻讦,俨成水火,力图争夺理学正宗嫡传资格。然而无论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还是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都可以从二程的“洛学”中找到源头,这是因为二程兄弟在创立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虽然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于细微处仍存在一定的差异,论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程颢强调的是“一人之心即是天地之心”,“传圣人之学”就是“传圣人心”,而“传圣人心”就是“传己之心”,显露了心学的端倪。程颐突出的是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理是客观的至上的抽象原则,奠定了理学的理论基础。二程兄弟的这种分野,在北宋时期并不明显,而且相互补充。一到南宋,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对二程不作区分,一视同仁,但其学术思想却以继承程颐为多,程朱理学中的“程”,主要是指程颐。陆九渊则不然,他对二程兄弟区别对待,对程颐颇多微词,屡有批评,而对程颢则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可以说,程颢是“心学”派的开山祖师,而程颐则是“理学”派的宗师。兄弟两人分别开理学两大派系之先河,这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程兄弟,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其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两人的遭遇颇多坎坷。从南宋末年起,二程的地位陡增。宋理宗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陪祭孔庙。元文宗追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这样由二程奠基的理学便从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逐步上升为居为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深远。